

新时代新标准下的检视和反思

◎ 魏道儒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结合自己的科研实践,叙述了“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价值和作用。在逐一检视、反思已经完成的五项主要课题基础上,叙述了几点构建佛教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心得体会。

关键词: 新时代 宗教学 佛教 “三大体系”

作者简介: 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确定了战略任务,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是指导我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本文结合检视自己的专业研究实践,谈几点初步学习心得和体会。

一、宗教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段话对于我们认识“宗教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宗教学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系统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具体学科的形成有先有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其政治作用、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社会需求等,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宗教学”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被忽视、轻视甚至歧视,“宗教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经常被讨论,成为困扰学者的悬案。习近平总书记把“宗教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宗教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作用和性质。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宗教学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不是一个可以被边缘化的学科,宗教学科是否完善,宗教学术事业是否高质量发展,直接影响着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完善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没有一个完善的、高质量的宗教学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不足之处,就有缺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科。

其次,宗教学与其他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隶属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列举的11个对哲学社会科学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是并列的,相互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隶属关系。因此,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宗教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10个学科有着同样的重要性,是一个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具有独立地位的学科。也就是说,宗教学并不是某个具有“支撑作用”学科的从属学科,它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实际上可以完全平息“宗教学”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的争论,可以完全消除我们再用几十年前的观点看待宗教学。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仍然用几十年前的眼光打量宗教学,仍然为宗教学研究画那么多道道、杠杠、圈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三大体系”）的空前发展繁荣，就没有我国宗教学术事业在完善政府宗教管理工作、在促进各宗教健康发展、在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再次，我们要构建的宗教学科应该与其他学科具有同样的特点，同样的标准。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也是三个方面的原则，三个方面的标准。即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条是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当然也是对宗教学科的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宗教学科过程中，应该以这三个原则为追求目标，从而把“宗教学”打造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无论在宗教学的学科体系方面，还是在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都应该体现“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

建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我是在改革开放伊始进入大学校门，逐步走上科研道路的，有幸赶上了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空前发展的好时代。对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而言，这30余年，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黄金时代。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认识到，自己在此期间所做的各项科研工作，本质上是从事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工作。作为科研一线的普通工作人员，在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入继往开来新时代的时候，从加速构建宗教学“三大体系”的角度，对照新标准新要求反思自己以往的科研工作，检视自己此前出版的主要成果，将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性质和价值，有利于自觉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成果。

二、对五项课题的检视与反思

我从1981年接触佛教资料，三十多年来，承蒙前辈老师的谆谆教诲，同事们的真诚帮助和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已经完成了一些研究项目，其中既有个人独立完成的课题，也有合作完成或集体完成的项目。大致说来，能够比较集中反映自己学术进展的工作有五个项目：独立撰写的《宋代禅宗史论》《中国华严宗通史》《中国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在杜继文先生指导下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

第一，《宋代禅宗史论》。1987年，我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是杨曾文和杜继文先生（杨曾文先生主要负责）。杨曾文先生根据我以前的学习经历和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指导我从事宋代禅宗方面的研究。因为当时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唐代及其以前的佛教研究比较多，宋代以后的佛教研究就明显薄弱了，当时还没有以宋代禅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在当时是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按照杨曾文和杜继文先生的指导，我拟定了《宋代禅宗史论》这个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在论文答辩之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按照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以《宋代禅宗文化》为名出版。这本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宋代禅宗文化的断代史著作，首次利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论述了宋代禅宗的发展阶段，系统阐述了宋代的文字禅、默照禅和看话禅等禅法体系，分析了禅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学术界，该书对于研究宋代及其以后的各种禅法体系是有明显启发、参考作用的。当时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任继愈先生对这篇习作有一句肯定：“用这么多资料论述宋代禅宗，在学术界还没有过。”有一句希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工作。”

通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我记住了前辈们强调的四点内容，并且在自己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努力坚持下去。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科研工作中，要始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捕捉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要用社会史的变迁说明宗教的变迁。

结合到自己佛教研究的实际,就是要用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分析、阐述佛教生活方式、修行方式、传教方式乃至重要思想和制度的变化。其二,重视选择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第一步是选择研究课题,这一步是否成功,直接决定着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决定着最终成果的学术质量、价值和影响。其三,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在尽量全面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研究工作。资料收集是否完备,整理是否认真,分析是否精密,直接决定着最终成果的质量和所能达到的高度。其四,要有扎实的学术史功夫。在研究对象确定之后,一定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以往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向。

第二,《中国禅宗通史》。1990年,鉴于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展开对中国佛教宗派进行贯通性专题研究的现状,杜继文先生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禅宗的通史著作,并让我参与撰写工作,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宋元明清部分。1993年,《中国禅宗通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禅宗通史著作,叙述从印度禅学到清末禅宗的流变历史,时间跨度2000多年。该书以系统阐述众多禅思潮、派系、典籍和人物为主,深入分析禅学与戒律学、般若学、唯识学、华严学、天台学、净土、密教的多方面交流和整合,记述禅学与道教、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冲突、融合和互动过程。该书还注重揭示制约禅宗兴衰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等因素,考察禅宗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对外传播中的作用。该书于1995年获全国古籍类图书出版二等奖,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从《宋代禅宗史论》到《中国禅宗通史》,我先后受到杨曾文和杜继文先生的指导,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真正能够独立从事佛教研究了;最大的体会是:有了好的老师认真负责的指教,有可能避免学生走弯路、走岔路。

第三,《中国华严宗通史》。从1993年初开始,我计划独立研究中国佛教宗派华严宗,撰写第二部中国佛教宗派通史著作。当时只所以选这个课题,也是认为这个选题具有创新性、填补学术空白性质,并没有过多考虑其他方面。我拟定和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华严宗通史》,获得立项。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不仅在收集、整理、分析原始资料上下功夫,在历史考证上下功夫,而且比以前更重视理论分析。这部书的学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首次把华严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也是三种形态,即“华严经学”“华严宗学”和“禅宗中的华严学”,提出从“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过渡,本质上是宗教文学向宗教哲学的转型;“禅宗中的华严学”本质上是中华特色的“禅学”,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最终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一。第二,首次系统梳理华严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提出了华严经学的“原初形态”“成熟形态”等命题,并进行细致梳理论证,为研究大乘佛教思想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第三,首次阐述华严宗学的形成过程、形成方式和本质特征,论证了佛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第四,首次论述华严宗丰富和发展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揭示了华严宗核心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华严宗通史》于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不仅在华严宗的学术研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于深入认识整体佛学,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和结构都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第四,《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华严宗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当时想到,学术界还没有把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千年”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著作,于是,我拟定并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宋元明清佛教史”项目,获得批准立项。在开始工作过程中,受到季羨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邀请,参加他们主编的《中华佛教史》工作,这个项目也成为其中的一卷。该书最初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12月出版,后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以《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为名于2013年7月出版。

该书是对佛教在中国第二个千年发展过程进行的贯通性研究，当时我主要的研究目标有三个：第一，系统梳理这一阶段各种佛学思潮的相互关系、流变过程，揭示中国佛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体结构 and 整体面貌，展示佛学发展的规律；第二，系统论述不同王朝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国内科学技术对本期佛教新格局形成及其演变所起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导向作用；第三，系统论述我国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对佛教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影响。这种把几个断代佛教历史进行贯通性研究，使人们更能看清佛教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新样态，更能看清佛教在长时段连续呈现出的演进脉络，从中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

第五，主编《世界佛教通史》。我在《世界佛教通史》的序言中，讲了主编此书的因缘：“2006年底，在制定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撰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设计并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这个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最后，本书于2015年12月出版。这部著作是国内外20多位佛教研究学者历经8年完成的项目，是集体创造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世界佛教通史》各卷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时，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

在《世界佛教通史·序言》中，我也简略介绍了这部书的一些价值，“各卷在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对于遇到的特殊情况、独有内容和重要问题，或者做出了填补学术空白的创新工作，或者做出了充实科研薄弱环节的提高工作，或者取得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闪光突破。在绝大多数卷都要不同程度涉及的佛教和平传播问题，佛教本土化问题，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等方面，该书所取得的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创新性成果更为丰富多彩，不仅对于以后的佛教研究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其他宗教，对于研究宗教学基本理论也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世界佛教通史》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全书的绝大多数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世界佛教通史》提出的问题、洞见的规律、形成的观点是对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比较全面认识、系统阐述和深度开发，能够为认识和处理当今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和理论依据。本书出版将近四年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好评。2018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9年获得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特等奖。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有一点奢望，就是希望这部《世界佛教通史》能够对打造中国特色的宗教学“三大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三、对此前工作的几点体会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等。对于宗教学科而言，情况也是这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加快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不是抛开以前打下的基础而另起炉灶，也不是否定过去的工作而推倒重来，而是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把建设“三大体系”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今天用新标准来审视以往的成果，也是存在着“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问题，存在着“处于有数量缺质量”的状况。具体说来，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很多，结合自己的具体实践，觉得以下四点比较重要，应该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视。

第一，始终坚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我从进入大学校门到今天的将近42年中，在专业学习和科研工作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位老师，即高杨、杨曾文和杜继文先生。在跟随他们学习和工作期间，他们都教导我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学术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在以后是始终要坚持的，不能动摇的。

第二，始终重视选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始终强调选题对最终科研成果质量的制约作用、牵引作用和助推作用，强调选题一定要有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原创性，一定要有可预见的把相关领域研究实质性向前推进的学术价值。无论是个人承担的课题，还是集体合作的课题，都是一样的。一般说来，往往捕捉到那些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课题，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在研究课题选定之后，研究过程中始终都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最终成果中一定有提出和解决的新问题，一定有成系统的新观点。这样，在完成了研究课题之后，都会有设计课题之初所未曾意料到的新收获、新体会、新发现。

第三，对学风、对做学问要有正确的态度。回想已经出版的这五个项目成果，我觉得，承担的任务不同，工作的性质、重点就不一样。个人独立研究，合作研究，带领大家共同研究，情况不一样，所思考的问题就不一样，自己的感受以及收到的成效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我来说，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要记住的三条重要原则是一样的。我于2019年5月28日受邀参加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表彰座谈会，在发言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在编写这部著作（指《世界佛教通史》）的八年时间里，我时刻提醒自己记住三条，并与同事们共勉：第一，学风端正是不可须臾偏离的生命线；第二，敬畏学问要贯彻在研究工作的始终；第三，坚信做学问的过程就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在30多年的科研工作中，这三条使我受益无穷。

第四，要认识到任何学术成果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纰漏、瑕疵存在。即便那些受到普遍好评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让人面红耳赤、汗流浹背的错谬，更不用说一些小的错误了。我在上述优秀成果奖表彰座谈会上发言时最后说：“当然，我和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心里都很清楚，尽管我们确实努力了，但是限于水平、能力和修养，书中存在的错谬之处、肤浅之处、偏颇之处一定是不不少的，有的已经发现了，有的大概以后才能发现。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得到获奖消息的时候，高兴之余，不免心中忐忑、惶恐甚至惭愧。本书所有的错谬当然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期盼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尽量消除已经发现的瑕疵。”实际上，这番代表全体课题组人员的表达也适用于我的其他成果。现在检视以前的任何成果，都有不足之处，都有错谬。

记住上述四条，会有利于今后的科研工作高效进行。总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时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一个新的任务。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伟大使命。

（责任编辑 周广荣）